

民族危机下的文化选择与文化自觉

——徐特立教育思想中的传统因素研究

张洪萍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教科院, 湖南 长沙 410105)

摘要:在近代国家、民族危机的紧张形势下,出于对富国强兵的迫切期待,知识分子对西方实用之学孜孜以求。由于大多数知识精英成长于传统文化背景,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有着认同和坚守。这种认同和坚守,在近代学人的思想和行为中时有体现,成为近代文化和教育推陈出新的动力之一。徐特立敏于西学,却又在教学过程中对传统教育内容主动吸收,对旧有教育经验和方法自觉借鉴,建构起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正是民族危机下文化选择与文化自觉的典型体现。

关键词:文化选择;文化自觉;徐特立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7)07-0012-03

近代以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大攻击下,中国利权不断受损。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紧张形势下,能速图富强的西方实用之学^①对国人具有难以抵抗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大多数知识精英成长于传统文化背景下,对中国文化有着天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这种外在民族危机下不得已而选择西学与内在的对中国文化的自觉认同的矛盾,在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体现得极为明显。本文以徐特立为中心,探讨近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下的文化选择与文化自觉的心理和行为,及其对文化发展和教育进步的影响。

1 民族危机下的文化选择

近代民族危机,始于鸦片战争,庚子国变后达到高潮。庚子以后,民族情绪高涨,从枢府权臣到草野学子,都意识到时事危急:“国威既损,国权既失,国维既破,国本既危,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休养生息动需岁年,彼鹰麟虎视者,能假我以从容布置之余裕乎。”^[1]这种民族危机,正是因为中国文化教育在中西争锋中败守所导致。加上日本在学习西方后取得巨大成功,让国人看到了“物竞天择”时期西方实用之学的魅力,故此,西学变为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清末乃至民国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

这种共识使得社会的选举制度也逐渐发生偏离:“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凡有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2]102}社会共识及选举制度的偏离,对于西学在近代社会的攻城掠地提供了良好契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的救国者,以西学为救亡之必要手段,自是不遗余力的提倡和追求;而以身入仕途光宗耀祖为私人目的的部分投机者,也因为通晓西学就能“破格擢用”,对西学也是孜孜以求。

这种外力和利益驱使下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实际是在民族危机下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虽然到了民国时期,对西学的认识逐渐变得理性,但列强的威胁一直存在,富国强兵的主流思想一直没变,故此,

收稿日期:20161226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4C0247)

作者简介:张洪萍(1976-),女,重庆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师教育研究。

① 西学能速图富强,是国人从日本迅速崛起中看到的希望,是否真的如此,是另当别论的。

西学一直是国人救国的首选。

在中西文化较量中,在西学逐渐取得优势地位的同时,也有部分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知识精英开始从西学的狂热中逐渐清醒,思考中国民族文化的坚守和发展。

2 文化自觉意识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坚守

国内最早论及文化自觉的是费孝通先生。费先生认为:“20 世纪的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3]

在西方技术文化的强大攻势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部分留学西洋或新式学堂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较多西方文化的熏陶,对西方文化没有太多的抵牾,反倒是对传统文化暂时丧失了信心,认为“中国学问既不能致中国于富强,也不能救中国于危亡,故通通可说是‘无用’,皆应暂时‘束之高阁’”^{[4]22}。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社会精英而言,“他们是受中国文化培养成长的,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由于他们基本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而对中国文化的长处有亲切的体验,甚至有归属感。所以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认同’”^[3]。

成长于传统文化背景的知识精英,在民族危机下主张革新和开拓,不得不吸收外来学说,以真正实现民族的强大;却又因为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有着由衷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求新的同时不能完全舍旧,甚至需要立足于旧有文化,才能更好地吸纳西方文化。而对西学的理解和吸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着传统文化并实现推陈出新。正是在中西文化的交锋和冲突、吸纳和坚守中,近代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日益“自知”,对自身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也认识得更加透彻,逐渐跳出以往中西文化竞争中偏听偏信之窘境。

徐特立作为近代精英知识分子之一,既当过私塾学生,又做过蒙馆教师,在他 28 年的乡村生活中,主要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可以说,早期的传统文化经验铸造了徐特立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成为其阅人处世和继续学习的基础。徐特立在读古书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就引入到近代科学了”^{[5]341},知识结构逐渐由传统经典向现代科学转变,思想和视野也逐渐摆脱乡村知识分子的局限。立足于传统经典并大量学习西方文化、逐渐成长为精英知识分子后,徐特立对传统文化并没有弃之如敝履,反倒是在潜意识中有着一种信赖和坚守,这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处处有体现。

3 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徐特立教育思想中的传统因素考察

徐特立从乡村来到城市后,基于改造社会的理想,西方文化一直是其学习的主流。但作为一位浸淫传统文化 20 多年的知识分子,徐特立对传统文化有着一份认同和坚守:“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服从,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推进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6]311}。不仅传统文化是发展新文化的根基,同样,传统教育也是中国新教育的基础:“我们的一套教育,不是凭空创造的,是接收遗产而来的,因人类的历史在发展,每个时期有不同的教育,我们的新东西是有历史根源的。”^{[6]29}惟其如此,在徐特立的教育思想中,传统因素随处可见。

3.1 对传统教学内容的吸收

徐特立走出乡村后,面对民族危机,他对西学孜孜以求,但幼年时期就接受传统教育,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其文化结构中的固化存在,也是其思想输出的重要来源。所以,徐特立在建构其教学内容时,传统文化总是自觉的体现其中。

徐特立在长期的小学教学实践中,常常苦恼于教授的不得法。他广阅中西近代教育理论,希望从中寻找解决路径,却发现“日人丰田所著之《缀方教授》,武岛所著之《修辞学》,其精粹处悉出于梁刘勰之《文心雕龙》及宋陈骙之《文则》,悉择焉不精,语焉不详,我国学子译而读之,不得要领,牵强附会,全失本意”^{[7]5}。既然外人之教育精义源于我国古籍,徐特立转而从我国传统文化中进行追寻,“要创造新的,必须整理旧的”^{[6]111},于是在湖南第一师范讲授教授法时,徐特立“爱就我国古籍,于教育有关者,随

时割记,并参考东籍,成教授法一书”^{[7]6}。

徐特立的《小学教授法》一书,包含修身、国语、算术、体操、历史、地理、理科、国画、裁缝、唱歌、手工等各科。修身、国语、历史各科,自是以中国古籍和传统文化为重要来源,即便算术、体操等其他科目,所用例子也往往和传统儒学有关。毕竟,幼时经验印象最深,加上其对传统文化的内心认同,故其进行知识和思想输出时,传统文化中的嘉言懿行和名人案例就会自然地呈现在脑海中,信手拈来。

3.2 教学经验和方法的自觉借鉴

在徐特立的教育生涯中,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对其影响甚大。但传统教育方法和经验,并没有从徐特立的教育活动中剥离,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体现在其教育思想和实践中。也可以说,每当在教育教学中遇到困难时,徐特立就会从传统教育中借鉴经验。

民国时期,教育经费奇缺。一心改造社会力图救国的知识分子和教育精英,往往因经费难筹,兴学无由而灰心沮丧,尤其是当他们和欧洲国家充裕的教育经费进行比较时,挫败感和无力感更是强烈。对于办学中的经费困境,徐特立借鉴传统私塾的办学经验,并不以之为难事:“若是有人说是无钱,我觉得办小学不能说此话。因为不要到外埠去请教员,只要本地人当教员。若是请本地人又何得无钱?他的父母家室,都在本地,真正没有钱的时候,将他一家五口或七口八口人,在一千多人里轮流吃饭,教员能够过活,他也愿意服务了。”^{[7]69}此法未必适合于知识分子流动日益常态化的近代社会,但却能看出徐特立内心深处对传统经验的认同。

在教育管理中,徐特立不太愿意以冷冰冰的规章制度对学生进行生硬的约束,而是借鉴传统诗教的方法,对学生进行温柔劝诫。他认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的方法,更不应该有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的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8]44}长沙师范的学生毕业时,徐特立就以一首《毕业歌》鼓励他们投身教育,尤其是乡村教育。在稻田师范时,有女生半夜不睡觉给爱人织毛衣,徐特立没有直言厉色教训她们,而是写了两首打油诗:“昨夜已经三更天,厕所偷光把衣编。爱人要紧我同意,不爱自己我着急”;“东奔西跑到西边,不仅打衣还聊天。莫说交谈声细细,夜深亦复扰人眠。”^{[8]50}由打油诗可以看出,对于违纪学生,既有对她们违纪扰人睡眠的批评,也有对她们的拳拳爱护之意。这种寓教于劝喻的方法,很受学生欢迎,学生不仅“每天都到黑板前面去看他老在打油诗中又指出我们哪些缺点,以便遵照他老的教育来改正”,而且也学了徐特立的方法,用于自己的教育工作,“收了很大的效果”^{[8]50}。

事实上,在徐特立的教育智慧中,处处都有传统教育方法和经验的影子。指导学生时,徐特立用《幼学》中“学足三余”的例子,鼓励学生抓紧得闲多余的时间读书;鼓励青年时,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对其精神和志向进行熏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近代学人在遭遇民族危机时,多数都有速图富强的功利思想。这种功利思想,使得他们在一段时间里,对传统文化缺乏自信,而对西学孜孜以求。20世纪以来,在学习研究西学的过程中,知识分子逐渐理性,开始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反省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拾信心,以之为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基础和根源。虽然,这种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估和自觉意识,近代学人没有像追求西学那样大肆鼓吹,但在他们的论著和思想中却若隐若现,光芒阵阵。徐特立敏于西学,却又在教学过程中对传统教育内容主动吸收、对旧有教育经验和方法自觉借鉴,正是近代学人在民族危机下所进行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自觉的典型表现,进而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和教育推陈出新的动力之一。

参考文献:

- [1] 江亢虎. 与袁慰廷书[M]. 北京:现代印书馆,1944.
- [2] 刘大鹏. 退想斋日记[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 [3] 费孝通.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J]. 学术研究,2003(7):5-9.
- [4] 罗志田. 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5] 武衡,谈天民,戴永增. 徐特立文存(第五卷)[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 [6] 武衡,谈天民,戴永增. 徐特立文存(第三卷)[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 [7] 武衡,谈天民,戴永增. 徐特立文存(第一卷)[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 [8] 周世钊. 我们的师表[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58.